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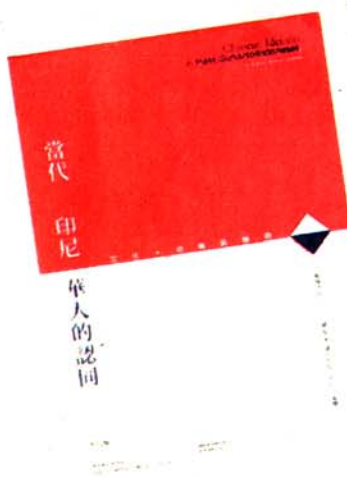
探索印尼华人的认同感

陈士铭 / 文

——介绍云昌耀的《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文化、政略与媒体》

在海外华人研究中，印度尼西亚华人无疑是深受学者关注的族群之一，毕竟，他们在这个2亿4000万人口的国度里仅占总人口的2%和3%，但却在当地的政经领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这样重大的角色及外界长期以来对他们产生的既定印象，造成这群海外华人在二战后历经沧桑，不时遭受印尼当局的歧视，甚至成为原住民暴力攻击的对象。云昌耀博士的《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文化、政略与媒体》(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就是通过对印尼华人的认同感探索，尝试为读者揭开印尼华人关于自己的国家以至本身的民族身份方面的精神面貌。

云博士目前任教于新加坡管理大学，主要研究印尼华人和印尼不同宗教之间互动的课题。由于他是一名华裔，出生于马来西亚，在文莱长大并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和生活，这让他一方面能够作为局外人来研究印尼华人的认同课题，另一方面他的“东方人”外表和行为



举止，加上能讲流利的印尼话、华语和中国其他方言，使他又能以局内人的身份进入雅加达的华人族群中，这是很少印尼学者和国际印尼研究者所能做到的。

云博士的著作

共分为三篇，首篇是测绘“华人问题”，其次是探讨华人文化要素的变动，最后则是剖析印尼族群界限的维系基础。在首篇里，云博士考量调解印尼华人认同的几个不同理论取向，并勾勒出印尼“华人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构筑，以揭示原住民一直以来依照历史构筑的刻板印象来理解华人的原因。在第二篇里，云博士介绍了印尼华人在雅加达所过的不同生活方式，并探索1998年后华人身份在当地所出现的复杂意义。到了第三篇，则通过对种族、阶级和族群性概念的阐述，探讨了印尼华人与原住民用来维系划分族群界限的各方面特定标记。

以雅加达作为记录场址

著作的一大特色是以首都雅加达作为场址的厚重实地记录，主要包括参与式观察，以及对当地华人和原住民受访者的访谈。云博士选择雅加达是考虑到这个城市作为国家的首都，自然吸引了来自印尼其他省份的学生、年轻工作者、商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可说是个杂烩着各种认同的大都会。此外，1998年5月的排华暴动发端于雅加达，而暴乱严重程度也甚于其他城市。到了近年，雅加达更见证了华语中心、华人出版与媒体，以及各领域的华人组织的涌现，理所当然成为最能够察觉印尼华人认同感的地方。

可以这么说，印尼华人在当地的困境早在荷兰殖民时期就已经埋下因子。荷兰殖民政府一直对于华人和原住民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致使华人移民没有在殖民时期与原住民同化，而华人在反殖民运动中的“缺席”，更成了日后族群对立的潜在因素，因此印尼在98年陷入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华人沦为经济危机的代罪羔羊，追根究底就可看到这些沉淀历史因素的

影子。

本土性决定国家认同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说过，民族国家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并且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民族国家内部的人们“相互连接的意象”也要“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而作为印尼人口一份子的华人，他们的“想象”理应纳入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度里。

但正如云博士在书中感叹，不幸的是，现代印尼民族主义从未成功地让华人归属于其对印尼一个想象民族共同体的构筑中。国家认同感在印尼过去发展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是由本土性(indigeneity)而非公民身份(事实上，印尼华人很长时间也没享有完全公民身份的待遇)所界定，这种情况就注定了许多印尼华人即使本身的祖先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好几个世代，他们在许多印尼其他族群的眼里也依然是被视为局外人或是外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云博士的著作除了凸显出印尼华人和原住民之间“想象的界限”外，以及二者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与歧视偏见，也揭示外界忽略的印尼华人异质性课题。撇开大家熟知的印尼华人有富商和穷人等社会地位和阶级的差异性不提，不同地域的华人自我认同就已经呈现异性，例如雅加达的华人性，就与棉兰(Medan)、三宝垄(Semarang)和坤甸(Pontianak)的华人性迥然不同。

总之，《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一书是深入了解印尼华人的必读之作，也难怪此书的中译本在台湾面世后，受到了当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